

略论文史研究中地方志的利用

贾三强

摘要: 地方志对于解决文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诸如政治、经济事件的来龙去脉, 历史人物生平活动, 文学作品的系年等等, 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以明代世庙大狱、明中期陕西盐政、明初陕西文学以及王安石文系年等问题为例, 说明地方志在文史研究中的价值。

关键词: 地方志; 政治史; 经济史; 人物研究; 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4-0001-07

以往文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诸如政治、经济事件的来龙去脉, 历史人物生平活动, 文学作品的系年等等, 由于史料的缺乏, 常常模糊不清。而随着各种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和被利用, 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近年来, 笔者在研究中屡涉地方志, 深感其在文史研究中有其其它文献不可取代的作用, 故略加论述。

一、方志之佐证史事

地方志可以修正和补充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旧有记载, 丰富我们对于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认识。

我们以往对于历史的印象, 大都来自于正史的描述。从春秋时代以来, 总体来看, 记载历史的是一批批学问最好, 并且人品高尚的学者, 因此给我们留下了堪称世界之最佳的翔实且丰厚的史书文献。但是不可否认, 这些记载也有明显的缺陷, 除了任何学者都无法避免的错误之外, 还有详于中而略于外, 重主干而轻枝叶之弊, 因此即便是孔子这样最优秀的史学家的成果《春秋》, 也难免“断烂朝报”之讥。

而地方志记载史事, 因多属本地发生, 且记述者往往是当事者, 故其所述真实性较强, 可以修补正史之缺讹, 扩展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

反抗朝廷官府的民变, 历来是史家记述的重点, 因为这关系到统治者地位的稳固性。因此中国的“农

民起义史”是一门大学问。然而由于这些民变多发生于畿外各地, 发生时往往会引起当地的动荡混乱, 信息在传导过程中会发生偏转, 因此史书记载中的农民起义也往往是简略扭曲且混乱的。但是, 方志的编纂者因为身处当地, 对相关的信息的掌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记往往更为可信。

明代嘉靖五年的李福达借白莲教谋反案, 是震动朝野的大事。与朝政关系之密切, 朝臣受株连之众, 均罕有其比者。始而定罪, 继而翻案, 时隔四十年后再度复审, 再度翻案, 其真相扑朔迷离。这也被称为“世庙大狱”。《明实录·世宗实录》卷66“嘉靖五年七月乙酉”条载是案之缘起:

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等言: 山西太原府崞县人李福达, 初以妖贼王良、李钺谋反事连坐, 发戍山丹卫, 逃还改名李五。清军御史勾发山海卫, 复逃还, 寓陕西洛川县, 妄称弥勒佛教, 诱惑愚众。县民惠庆、邱进禄辈俱往从之。福达以是居积致富, 诳进禄等言: “我有大分, 宜掌教天下。今暂还家。若等宜聚众俟我。”遂将家还山西。进禄等事觉, 见捕急, 遂聚众为乱, 授官爵, 杀伤吏民官兵。捕获, 供称李五首谋。福达闻事发, 复亡入五台县, 易姓名曰张寅, 往来山西徐沟县同戈镇。已, 又挟重资来京, 窜入匠籍, 以资纳为山西太原卫指挥使。其子大仁、大义、大礼俱补匠役, 诡能烧炼和药, 往来武定侯郭勋家甚密。久之, 踪迹顿颇露, 乃回同戈镇。其讎薛良首发之。福达惧, 复亡入京, 官司捕得其子大义、大礼, 案治之。福达窘, 乃身自抵正, 而贿求武定侯。郭勋书抵巡按御史马录, 为之嘱免。录不从,

收稿日期: 2009-01-25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四人文集校注整理”(06H006Z)。

作者简介: 贾三强(1954-), 陕西户县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

竟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臣等谨按，福达以妖术惑从，邵进禄等之反，实福达首谋，寘之重典，厥罪允宜。但郭勋以勋戚世爵，乃交通逆贼，纳贿行嘱，法不可宥。请并逮治之。得旨令诛福达父子，并没入其财产，妻子为奴。郭勋令对状。勋具服谢罪。

上特宥之。给事中程略、刘琦、王科各言劾罪重，不宜赏。章下所司。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56《李福达之狱》于此案的审理过程及后续发展有详细的记载^①：

先后鞠讯者，代州知州杜蕙、胡伟，证之者李景全等。具狱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复上巡按御史张英，皆如讯。独巡抚毕昭谓：“福达果张寅，为仇家诬所致。”反其狱，以居民戚广等为证，坐良罪。狱未竟，昭乞侍养去。会御史马录按山西，复穷治之，传爰书如前讯。勋为遗书嘱免，录不从，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飞章劾勋党逆贼，并上其手书。帝下之都察院，席书亦助勋为福达地。大理寺评事杜鸾上言劾勋及书，乞将二人先正国法，徐命多官集议福达之罪。不报。都察院覆奏李福达罪状，宜行山西抚、按官移狱三司会鞠。

据《明史纪事本末》，世宗皇帝初从群臣之议，鞫狱待决，并诘责武定侯郭勋，令自输罪。然郭勋为了摆脱干系，多次指使他人作证或亲奏世宗，言李福达之冤，造成案件的一审再审。世宗一度欲自己亲审此案。郭勋甚至将此案与此前的“大礼议”案相联系。彼时世宗为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杭为皇考献皇帝，与以杨廷和为代表的百官激烈冲突，唯有张璁、桂萼等少数大臣站在皇帝一边。有五品以下共 134 名官员被投入诏狱并受廷杖，其中 16 位官员毙命。在张寅案发时，郭勋深知大礼议是嘉靖皇帝的心结，于是“乃与张璁、桂萼等合谋为蜚语，谓‘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勋，渐及议礼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说，而外廷不知也。”这是造成案件长期往复不决的根本原因。

六年八月，世宗独断，以群臣“朋奸陷正”，将主张严办郭勋的群臣逮系，“死桎楚狴犴者十余人，余戍边、削籍，流毒至四十余人。谪大理少卿徐文华、顾佖戍边。”此后一直到四十年后的嘉靖四十五年，案情查证才有了进一步的结果。是年：

^①《明史纪事本末》（下），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61-65 页。

四川妖寇蔡伯贯反。已而就擒，鞠得以山西李同为师。四川抚、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狱。自吐为李午孙，大礼之子，世习白社妖教。假称唐裔当出馭世，惑民倡乱，与《大狱录》姓名无异。抚、按官论同坐斩，奉旨诛之。都御史庞尚鹏上言：“据李同之狱，福达之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烈矣。郭勋世受国恩，乃党逆寇，陷缙绅。而枢要之人，悉颐指气使，一至于此。万一阴蓄异谋，人人听命，为祸可忍言哉！乞将勋等官爵追夺，以垂鉴戒；马录等特加优异，以伸忠良之气。”穆宗从之，凡当时死事、谪戍者，皆得叙录，是狱始明。

这个案子之所以一波三折，真相莫辨，是因为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单就案情来说相当单纯，只要弄清山西太原府崞县人张寅，是否为在雒川借白莲教造反的李福达李午（五）。如真系此人，便不存在其仇家薛良诬告之事。而乾隆《宜川县志》卷之八《艺文》下《记》有署名“明邑贡刘子誠、横州知州”者《关庙碑记》，于此事有记载：

当武宗末年，李午作难，以妖术陷雒川县。雒与宜川县邻，移师攻宜，势甚张。宜北门内庙壮缪遂显焉。贼薄城急，见红面巨人当门，无不胆落。午饶机智，先期逸，党胁尽剿。庙碑俨然可按也。先大人所目睹而口授之。

文后自注：

《记》内李午，即世庙大狱一案之张寅也。因争场打死人，逃出洛川县，以妖术煽惑。陷洛川，杀官劫库复攻宜川。壮缪显灵，败绩而逃。午挟妖术不知何述，认为张皇后之侄^②，改名张寅焉。及朝审，竟作张寅。当时讯官并各疏参，指李午者俱以无故，故八人死罪，遣戍八十余员，毙于杖下者大同巡按某及某某。洛川县民石文举与李午善，知之最真。逮至京师朝审，浑李午服科道衣同班走，文举又指曰：“此李午也。”可谓真正无疑矣。世宗以独断为明，坐多官罪，李午脱然无事。《实录》见在，竟成铁案。所谓礼失当求之野者何在？但事甚野而鲜人知，终无野史可参考，故记之。

^②《明史》卷 114《后妃传二》：“废后张氏，世宗第二后也。初封顺妃。七年，陈皇后崩，遂立为后。是时帝方追古礼，令后率嫔御亲蚕北郊。又日率六宫听讲章圣《女训》于宫中。十三年正月废居别宫。十五年薨，丧葬仪视宣宗胡废后。”《明史》册 10 第 3530-3531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以下引用《明史》版本同。

第人卑言微，谁其信之？

方志中所载对史实的补充，一是说明了李午之变是在陕西宜川被平息的。至于关圣显灵，极可能是在官军强势追剿中，民变军中的讹言，后被认假为真；二是李午改名张寅，是为了借此时正受宠的张皇后之名张势；三是李午之被指认，虽《李福达之狱》中说到“众证李景全等共指福达”，但具体情况不详。此文之注中明言“洛川县民石文举与李午善，知之最真。逮至京师朝审，浑李午服科道衣同班走，文举又指曰：‘此李午也。’可谓真正无疑矣。”“《实录》见在，竟成铁案”之谓，似于嘉靖四十五年李午之案最终定讞知之未详。嘉庆《延安府志》卷77《文征》3《序传志铭》录（明）倪元璐《广西横州知州豫庵刘公墓志铭》，谓墓主刘子誠生于嘉靖乙卯（三十四年），卒崇祯甲戌（七年）。故文中言此事闻之于其父，是可信的。刘氏活动时期距该案不久，本人又身处李午民变所及之地，故其言颇可采信。此《记》及注为李福达之狱中被害受惩的官员均属蒙冤，提供了补充证据。明世宗皇帝亲断的这大案，是一大冤假错案。

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也颇受重视。地方志中多有食货及相关的文献，可为此类研究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盐务是古代经济活动中的重要部分，既关乎国计，又关乎民生，既是国家巨额税收来源，又是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物资，故从西汉以来，我国一直实行食盐国家专营制度。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国家组织生产并统一定价，由商家经特许后经营。因此很容易出现统治者借机搜括，奸商乘机渔利，造成以次充好，盐贵伤民等后果。私盐的存在，尽管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但是其质量由市场决定，且价格相对便宜，于民亦有有利的一面。因此，如何在国家掌握食盐官营大方向的同时，在政策上做些调整，在国家指导下放开一些食盐经营，甚至在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公盐难以供应的地区，将私盐纳入国家管理的渠道，于国家有利，于民生亦有益。

明代盐务，仍袭西汉以来之制，国家统一生产，由领有国颁盐引（凭证）的商家特许经营，交纳一定的税费。“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①

明初北方边关因运力限制，粮食匮乏。朝廷采取了开中法，即让商户将官粮运抵边关，再付给其一定的盐引，去南方指定的地方提出食盐，以充运

费。这样节省了大量的运力。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指盐商主动申请参与运粮赴边关的系列行为，即依国家要求，将粮食运抵边地粮仓，换得指定盐场的盐引；守支指是盐商等候从盐场支取食盐；市易指将盐在规定地区出售。这项政策初行时效果甚好。故《明史·食货志》四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②其行既久，至明中期弊病丛生。嘉靖十三年，给事中管怀理上奏，将盐政之弊概括为六点，一是开中征取粮食的时机选择得不好，造成米价的上涨；二是报中往往被势豪大家垄断，使得其它商家很难参与；三是在开中过程中，官吏乘机盘剥渔利，使得输纳各环节出现问题；四是盐场不能及时兑现商家凭盐引支取的食盐，动辄需时数年；五是官盐定价太高，利润大都归于朝廷，因此造成销售困难，使商家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六是因此造成官盐的市易困难，而私盐便乘机泛滥。而有关部门为了解决官盐销售不畅问题，又设余盐，即国家规定额度之外所产之盐，作为正盐的补充。余盐不参与开中，商人可以从盐场购买后直接销售，获利丰厚，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③但是这也造成国家对盐务管理难度的加大，使得私盐问题凸显。因此朝廷又不得不加裁制。

至二十年，帝以变乱盐法由余盐，敕罢之。淮、浙、长芦悉复旧法，夹带者割没入官，应变卖者以时估为准。御史吴琮又请各边中盐者皆输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书许赞即请复开余盐以足边用。户部覆从之，余盐复行矣。^④

然而这样的政策，助长私盐的泛滥，使国家收入大量流失。因此，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力图解决盐政之弊。嘉庆《延安府志》卷74《条议》录明·张鍊《盐法议》。雍正《陕西通志》卷60《人物》6《直谏·明》谓，张鍊字伯纯，武功人，嘉靖甲辰（二十三年）进士，以行人选刑科给谏。疏奏无所忌，以忤权要，被廷杖，几死。传世有《太乙诗集》5卷。故其在朝正是上述盐弊丛生之时。其《议》曰：

夫食盐，山泽自然之利天下，所以养民也。上古无征，近古薄征以佐国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后利国为可贵耳。关中食盐，一出于河东，一出于花马池，一出于灵州，一出于西章^⑤。去

①《明史》卷80《食货志四·盐法》，册7第1931页。

②同上。第1935页。

③同上。第1941页。

④同上。第1941-1942页。

⑤西章：其地未见载史籍。《明史·食货志四·盐法》谓：“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和盐井。”册7第1933页。据此，西章或当为西和、漳县合称。

三辅绝远，专供灵、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无容议矣。花马池盐，北供延、庆、平三府，宁、榆二镇，南与河东盐并行于三辅间。河东盐上下公行，谓之官盐；花马池盐私者贸易，谓之私盐。民间便于私盐，不便于官盐者，百年于兹矣。

必欲行河东官盐，其弊有四：盖行盐郡县，各有分界，所司徒知纸上陈迹，河东盐行三省，不可越缩。若究其实，在山西、河南未知何如，其在关中，自长安以西，河东美盐，绝迹不至。间有至者，皆泥滓苦恶，中人不以入口，惟耕夫寡妇龟勉食之，计其所售无几也。名虽谓行，其实未尝行之：一也；往来商人，虑恶盐不售，告发郡县，使所在辇运外加样盐，包封计之，及以给民。封者自佳，辇者自恶。唱户分盐，畏如饮鸩；计账征价，峻于正税。今虽暂止，既为故事，恐不能已：二也；商人卖盐与贩夫，随以小票，盐尽票不收毁，官盐不至西路，则无票，无票则通责店肆。负贩细人，请东路自买未毁之票缴官，公人亦幸免责，不问由来，互相欺抵：三也；贾买票日久，奸人依式私制盗卖，侥幸者冒利，败露者破家，虽有防禁，迄今未已：四也。

必欲禁花马池私盐，其弊有五：关中民贫，衣食驱遣，赋税催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贩盐，冀俸斗升之利。一为公人所获，则身入陷阱，家计尽空：一也；贫人既为囚繫，内无供馈，冬月多毙于狱。考驿递囚，贩盐徒居半，死者又居强半。民命可恤：二也；小贩惧捕，结聚大伙经山溪要隘。偶遇公人，势强则抵敌，势弱则冒险奔迸，投崖落涧，人畜死伤涂地：三也；公人与有力惯贩者交关，终岁不捕，反为盗护，惟单弱贫瘠者捕之。或以升斗恶盐，强入路人筐袋，执以报功，使无辜受害：四也；众役工食，悉有定例，惟巡捕工食，私帮公费，岁增十倍，官吏比销，徒御劳悴，动经时月，候文旷职，旅食空囊，或罚或贷，俱为无补：五也。

夫物力不齐，物之情也；好美恶恶，趋利就便，民之情也；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哀多益寡，因俗成务，司国计者之情也。以物力言，河东旧商带支坐困，新商超纳无几，浇晒徒劳，增课未减，公私俱称歉矣。河东一池虽差大，供三省则不足；花马二池虽差小，供三郡二镇则有余：自然之势也。以人情言，河东盐百方督之使行，至以泥沙勒售，假票甘罪，而终不能行；花马池盐百方禁之使不得行，至于比屋

破产，接踵丧生，而终不能禁者：民之大欲大恶，不可强也。以国计，河东岁课，一十九万有奇；花马二池，岁课不盈数千。河东盐一引三钱有奇，二池盐一石六分有奇。如是相悬者，意河东与天下六运，自祖宗朝俱有定额，由来久远；二池迫近塞垣，弃取不时，故课亦微渺。后来因循取足，原辨而止耳。夫河东盐既不能及远，二池盐卒不能禁，民间又不可一日无盐，而盗买盗卖，终非常理。今当直开二池盐禁，使西凤汉中，沛然通行。计三府所当常食河东盐一十二万有奇，岁课即照河东，责三府代办，以其事权统归河东巡盐御史，则达观无异，督禁有程，两地岁征，四镇年例，保无纤爽，而关中可少事矣。夫居害者择其寡，兴利者取其多。倘今不弛二池盐，禁则愚民被逮供馈为费，罪赎为费，奸人骗诈为费，兵民岁增工食为费，官吏比销为费：一切显隐猥杂，不可会计，财足抵河东、花马二池正课出，于千疮百痛，徒然费之，而下残民命，上损国体，又余殃也。倘今一弛二池之禁，则愚民被逮供馈可省，罪赎可省，奸人骗诈可省，岁增工食可省，官吏比销可省，一切显隐猥杂，不可会计，财足抵河东、花马二池正课出，于不识不知，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国体，又余福也。夫人情不甚远，比闻盐法侍硕，皆一时英硕、表表长者。使其闻见悉如关中人，习知其利病，则亦何惮而不为良处哉。但其受命而来也，惟以行官盐禁私盐为职，而反是则骇矣。地非素履，事未前闻，虽圣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虽然，安国家，利百姓，大夫出疆义也。究理从长，议政从便，人心不昧，因革有时，此又关斯民之幸不幸也。

此文对于明代中期盐务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在于：

第一，指出官盐经营之弊。据《明史·食货志》四，明代各盐场所产盐，只能在指定地区销售。“河东（解州）盐行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地有两见者，盐得兼行。隆庆中，延安改食灵州池盐。”“（灵州、漳县、西和）盐行陕西之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岁解宁夏、延绥、固原饷银三万六千余两。”据此《议》言，只由河东供应关中东地区的食盐，有诸多弊病。一是因河东盐供不应求，使盐价腾贵，以次充好，官盐销售不畅，民怨沸腾，

滋生出不愿经营官盐，伪造许可证书等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二是盐是民生必需物资，官盐不行，必然导致私盐交易活跃。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受到严格限制，从事私盐运输经营者不惜铤而走险，往往会付出惨重代价等。而缉查私盐的成本甚高，官吏不堪其苦；三是挫伤盐商经营的积极性。旧商守支即等待以盐引支取食盐的时间过长，因而造成经营困难；四是食盐经营不善，使国家应有的税费收入大量流失。

第二，提出了应对之道。既然河东之盐无法满足关中之需，不如将关中私盐的产地花马池的禁采令弛放，将该池规定为关中盐的供应地，纳入官盐系统。这样，以往因规定河东盐为关中食盐唯一供应地带来的各种弊病均可迎刃而解，“下活民命，上全国体，又余福也”，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他看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物力不齐，物之情也；好美恶恶，趋利就便，民之情也”。即一时一地商品的短缺，这是很自然的，无法避免；而百姓喜欢物美价廉的商品，商人的逐利就便，这是人之常情，无法改变。因此造成了“民间便于私盐，不便于官盐”的普遍的违法现象。主政者不应对此严加约制，而应因势利导，即“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哀多益寡，因俗成务，司国计者之情也。”总之，要顺应民情物情，而不要与之相忤。他说的是盐务政策，但至今看来，对于发展市场经济，仍具一般意义。

但是朝廷看来并未采纳张鍊的建议：

三十九年，帝欲整盐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懋卿，严嵩党也，苞苴无虚日。两淮额盐银六十一万有奇，自设工本盐，增九十万，懋卿复增之，遂满百万。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残盐，共得银几二百万，一时诩为奇功。乃立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获私盐有定数；不及数，辄削其人雇役钱。逦卒经岁有不得支一钱者，乃共为私贩，以牟大利，甚至劫估舶，诬以盐盗而执之，流毒遍海滨矣。嵩失势，巡盐御史徐爌言：“两淮盐法，曰常股，曰存积，曰水乡，共七十万引有奇。引二百斤，纳银八分。永乐以后，引纳粟二斗五升，下场关支，四散发卖，商人利亦什五焉。近年，正盐之外，加以余盐；余盐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单；添单不足，又加添引。懋卿趋利目前，不顾其后，是误国乱政之尤者。方今灾荒迭告，盐场淹没，

若欲取盈百万，必至逃亡。弦急欲绝，不棘于此。”于是悉罢懋卿所增者。^①

鄢懋卿以堵代疏盐务政策的失败，更反衬出张鍊的远见卓识。

二、方志之考订文学文献

历史人物的行年与作品系年是对其研究的基础。近年来，学界有多种文学编年史问世，学者称便，帮助颇大。然其撰作，须基于人物和作品较为详细的编年。且传记类的研究，也必须具有其作品较为精密的编年，方才能够有准确把握。而方志中此类记载往往可补其它史料的不足。

王安石《慈溪县学记》是体现王安石早年教育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②。庆历四年，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以富国强兵，兴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庆历四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兴学：“诸路州府军监，并各立学，及置县学。”^③从此天下郡县办学之风大行。庆历新政的主要目标是整顿吏治，故培养人才成为要务。而此《记》中对于学校教育重要性的强调，如行政宣教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对于天下太平之“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而立学之本意也”，以及对以学生规模作为立学标准的不以为然，都在他日后的变法活动中可以看到。其变法将人才的培养放在突出的位置，“太学三舍法”和“贡举法”都与培养人才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因此弄清其撰作的相对准确的时间，对于王安石研究是有意义的。

然此《记》的系年，众说纷纭。文中提供了一些线索，然语焉不详。其曰：“今刘君在中言于州，使民出钱，将修而作之。未及为而去，时庆历某年也。后林君肇至……即因民钱作孔子庙，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为学舍，讲堂其中，帅县之弟子，起先生杜君醇为之师，而兴于学。”其撰作时间，据文中所言，一是在庆历某年刘在中离任，林肇继任后不久；二是与延杜醇为学师前后。

王安石有《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文中言：“某得县于此逾年矣，方因孔子庙为学，以教养县子弟。”杜醇其人，据（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8《郡志》8《叙人》上载：“慈溪人，经明行修，不求闻达。庆历中，县令林肇一新乡校，请公为之

①《明史·食货志四·盐法》，册7，第1943页。

②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临川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133-3139页。

③（宋）李焘撰、（清）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影本）卷153，册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18页。

师，不可。王文公安石再为林作《师说》以勉之。至今与杨公适并祠于县学。”^①慈溪县，在今浙江，与王安石曾任县令之鄞县为邻。王安石为鄞令的时间，据清顾栋高谓在庆历七年（1047）至皇祐元年（1049）间^②。“得县逾年”而请杜醇入县学，则《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作于庆历八年。《记》或当作于同时。

然顾氏系《记》于庆历七年四月，未言何据。李德身系于皇祐元年，云：“慈溪属明州，与鄞县相邻。此文记慈溪县长官林肇兴学经过，与《谢林肇长官启》同为知鄞时作。”^③今据明天启《慈溪县志》，二说皆误。该《志》卷2《儒学》谓：“庆历八年，令林肇徙今址，起乡先生杜醇为之师，鄞令王安石为之记。”其下注云：“旧《志》云，王安石起杜醇为师者。《林公传》，王自为鄞起之学，其后亦林公事。荆公《记》可据。”所言甚明，王安石在鄞立学后，林肇即于慈溪立学。二事同在庆历八年。故此《记》必作于是年。安石时年三十岁。

方志中可以利用的此类记载实在不少，值得充分发掘利用。

三、方志之补证文学史

近人所修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对主要史实沿革的描述，多据正史中《文苑传》、《艺文志》或名人所编撰的集子的序言之类的撮述，铺排而成。前人所见的资料较今人为富，且修史或编集之文士多属鸿儒硕卿，故其概括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但由于出于一人或数人之手，难免也有以偏概全甚或错谬。而地方志中，尤其是涉及明清以后部分，相关记载对于文学史常可起到补充说明或是纠正缺失的作用。

张廷玉等著《明史》卷285《列传·文苑》概述了明初文学状况：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祿、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它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④

文字虽简略，然其大端俱备。一是说明明初文学一

时称盛，诗文俱佳；二是明言明初文学承自元末。元末理学大盛，故明初沿之，使得文学中有浓厚理学气氛；三是精当地评论了明初文学代表性作家的成就。笔者所见陕西地方志材料，可与此互佐。康熙《蒲城县志》卷4《艺文》下《诗》录邑人赵晋追和元翰林学士虞集《王氏孝义》诗。虞诗云：

阴阴槐柳荫韦村，中有乌头孝义门。耕织事均家益贍^⑤，缁麻亲尽义弥敦。蜜蜂日暖开窗户，慈竹春深长子孙。先世此邦尝赐履，为歌遗俗却消魂。

虞集(1272-1348)，即上引《明史·文苑传》所云元季之“虞”，为元文学家、教育家、理学家。字伯生，号道园。追慕北宋理学家邵雍，故名其斋为“邵庵”，人称其为“邵庵先生”。《道园遗稿》所收此诗之题为“奉元王氏孝义”。奉元，即元代奉元路，明初改为西安府，即今陕西西安。

赵晋《又歌》：

君不见，总服亲尽犹同炊，扬氏敦仁不指疵；又不见，一门九世同驩怡，张公节义各唐隋。史编烂烂星日垂，天子临幸尝顾绥。金源南北共纷披，天纲欲绝人纪隳。寒飚冽冽水凝澌，有人独屋藏春熙。纠宗联戚良日规，帝衷不为俗所移。凜然千钧引一丝，终期宇宙廓坦夷。我复古唐轶黄牺，包罗万象撤藩篱。仁雨义风日洒吹，完其苦窳淳其漓。灵光巍巍不少欹，更以肯构培崇基。素业六传唯谨持，紫荆花满春风枝。金闺通籍仕日滋，扶摇九万控天逵。昆季和鸣如埙篪，绶若若兮甲累累。东阡南陌或耘耔，牙签插架盈书诗。田园膏腴稼若茨，仓曰千斯箱万斯。纺绩均劳谁忍私，衣食礼节秩尊卑。春秋报祀恒多仪，牺牲肥腍羞甘饴。倾囊倒困怜岁饥，茆独赆予洽恩慈。恭文蔼蔼众所窥，允矣郡邑之著龟。女抱孤节俦共姬，妇殉夫死志罔亏。孝友岂特一家推，令闻远彻宸难知。明诏下褒式群黎，乌头双表揭门楣。墓祀丽牲穹有碑，翰林妙笔太史辞。簠金遗子良多疵，操戈入室人伊谁。狗乳鸡哺非祥瑞，鸾鹄鸾翥今其时。淳也温淳金玉姿，汪汪可涵千顷陂。冠巍峨兮佩陆离，剡章新荐郡庠师。讷也众中擅白眉，言议开发属莫奇。安于之才能有为，紫垣乌府胥称宜。诒则明经析群疑，谨则振武先骤驰。碧梧翠竹光葳蕤，轩户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宋）詹大和等撰、裴汝诚点校《王安石年谱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6-40页。

③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④《明史》册24，第7307页。

⑤据四库本《道园遗稿》卷3《奉元王氏孝义》，“贍”为“贍”，是。

相望化日迟。渥洼神种尽骅骝，森然足见称家儿。福祉康宁天所僖，善述善继其在兹。庆源可鉴储清漪，余波浩浩春无涯。

诗中所言王氏一门节义事迹大都无可确考，故为其笺注颇难。然其大端可以略知。诗中王氏，指陕西蒲城义门王氏。其始祖为五代时期著名孝子王显政。其后孝义之人辈出，元延祐间曾被朝廷题匾“蒲城孝义之家”，列入国史，并得到县令“王氏孝悌，以兴民让”的表彰。虞集专赋此诗褒扬之。传世有欧阳玄撰文、危素书写《义门王氏先茔碑》，元代御立、危素书写、赵期颐篆额的《蒲城王氏祠堂碑铭》。^①此即诗中所言“明诏下褒式群黎，乌头双表揭门楣。墓祀丽牲穹有碑，翰林妙笔太史辞”。诗中所言韦村，又作苇村，即现在的蒲城县上王乡东苇村，至今仍有王氏后人居住焉。^②

《蒲城县志》卷2《人物》上《征召·赵晋传》：

赵晋，一名寅，字孟旸，质子，贤相乡人。元末举进士，授耀州判官，以诬坐免，隐居山南。与冯翊尚士行、渭南石相元等，乐道讲学，为关中学者所宗。后诬白，起为应奉翰林文字，不就。洪武初，设科主陕西试，名闻于朝，征为太子文学。每春官进讲毕，必召至别殿，坐语从容。字而不名。十一年赐安车还乡。

《志》卷2《人物》上《乡贤·元》：

王理，贤相乡孝义里人。其家七世同居。延祐、天历中，两旌其门。学士虞集有诗美之。见乡贤。按理父行五人，生理兄弟十四人，子侄二十七人。先茔二顷。有欧阳玄碑铭，危素书。

乾隆《蒲城县志》卷9《人物志》1《孝义·明·王嗣业传》言：“蒲以处士从祀乡贤者二人，元末王理，今则嗣业云。”

康熙《志·人物·乡贤·元》：

王，理从弟，仕延安府总管府知事。王琦，理从弟，尝辟吐蕃宣慰使司掾，未就。王玮，理从弟，累官至宣政院经历。

此正关照诗中“金闺通籍仕日滋，扶摇九万控天逵。昆季和鸣如埙篪，绶若若兮甲累累”之语。

《志》卷1《陵墓·仕宦节烈》：

元敕七世同居王理墓，在县东北三十里韦

村；明太子文学、元进士赵晋墓在韦村。

由此可见，赵晋与王氏同乡同里，故对其家事迹颇为熟知。诗中列举王氏一门孝义事，正是在元代后期大力旌表的。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笔者曾著文论及^③。其时作品多慷慨浩歌，壮怀激烈。明初朱元璋大倡程朱理学，与元一脉相承，而汉人亦有将此作为民族文化复兴之用意，其文化渗入甚深，故赵晋诗中言教色彩浓郁。而诗风一气流转，大气磅礴，与此时刘基、高启的歌行体颇为类似，正可印证上引《明史·文苑传》所言之不谬。此诗当作于明代初年作者由南京返乡之后，理由有二：一是诗中言“一门九世同欢怡”，王理因七世同居受旌在元延祐天历年间，当公历1314-1330年。而此后逾两世，约四五十年。二是高启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诗曰：“我生逢圣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而此诗则曰：“凛然千钧引一丝，终期宇宙廓垣夷。我复古唐轶黄牺，包罗万象撤藩篱。”用语何其相似！都写于明朝定鼎之后。作者明初曾入南京仕宦，颇受太祖推重，或当与刘、高诸子有文字之交。与其说是赵晋受高启影响，毋宁说是所处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使然。元末明初，陕西传统文学颇为不彰，这类作品的存在，更显弥足珍贵。

Brief Exposition of Using Local Chronicle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JIA San-q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because of deficienc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owever, there are profuse data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to solve such problems. This paper shows several examples: the unjust judicial case in the period of Ming Shi Zong, the salt policy of Shanxi province in mid Ming Dynasty, the literature situation in early-Ming Dynasty and the writing time of Wang Anshi's works.

Key words: Local Chronicles; political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character study; literature study

(责任编辑：黄云鹤)

①二碑现存蒲城县博物馆。

②采自《百度词典·王》，笔者据他书有删改。网址：<http://cache.baidu.com/>

③贾三强《略论明代文学思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110-116页。